

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美国政治体制？ ——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

周友刚¹ 张立垚²

1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2 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摘要 “三权分立”体制有利于形成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使美国引领一次又一次全球科技革命，却无法战胜资本的发展规律，而且“三权分立”使国家权力非常分散，广大民众也处于分裂状态，整个社会很难形成合力解决制约资本问题。“中央集权”体制非常有利于维护国家完全统一，使中国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富强，却很难形成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但“中央集权”使国家权力更容易整合，广大民众的“大一统”观念也坚不可摧，整个社会能够形成合力解决制约权力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走符合自己历史文化特点的发展道路，建立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三权分立；中央集权；制约权力；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610>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5.0706.80-95

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利有弊，所以自古天下无不亡之国。国家盛衰是自然规律，古罗马（分为王政、共和国、帝国三个阶段）^①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之一，长期实行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权分立制度，国家实力不断提高，版图从一个小城邦，扩张到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却因内部矛盾逐渐激化而走向灭亡^②；秦国^③在公元前 770 年被周平王正式列为诸侯，在商鞅变法之后，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秦朝（公元前 221 年至前 207 年），却因农民起义而土崩瓦解。

中美两国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体制，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独立、互相制衡，立法部门负责通过法律，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法律，司法部门负责保障法律的实施效力，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将管理国家的权力集中至中央政府，中央对

©The Author(s) 2025.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10 June 2025; Accepted: 25 October 2025; Published: 31 December 2025.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Email: cpcl@cpcl.hk, <https://ssci.cc>, <https://cpcl.hk>.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CPCL®. 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which permits non-commercial use, sharing,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or format, provided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source are credited, and derivative work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same terms.

^①公元前 753 年至前 509 年，罗马处于王政时代；公元前 509 年至公元前 27 年，罗马进入共和国时代；公元前 27 年开始，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分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其中西罗马帝国公元 476 年灭亡，东罗马帝国公元 1453 年灭亡。

^②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5-28 页。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270-276 页。

地方官员采用统一任命的人事制度，同时实行统一的财税、金融以及货币发行等经济制度，并坚持以主流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想文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呢？本文通过比较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及问题，提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建议，让中国长期保持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国家繁荣。

一、美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及劣势

（一）三权分立体制的优势

1. 三权分立的历史原因

气候环境对人的饮食、性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性影响。美国是来自英国的盎撒人^①建立的，而盎撒人则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生活在北欧地区（北纬54°至北纬80°）的古日耳曼人分支，由于天气寒冷，农业生产难以发展，依靠游牧/渔猎为生，所以盎撒人体格高大、崇尚武力，对海外土地和财富有着无尽渴望。盎撒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他们的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是族群主要财产是牲畜^②，这种财产很容易因天灾人祸损失殆尽，族群既需要一定的势力范围来放牧，还很难长期待在同一地区；二是个体必须要离开群体，游牧区土地的承载能力有限，人、畜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分开，所以个人与家庭、家庭与族群经常要分离。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文化传统。西方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出适应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保障个人自由，个人经常远离群体独自面对天灾人祸，还有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必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思想自由），以及独自采取行动处理各种问题（行为自由）；尊重个体生命，族群发展依赖个人发展，只有个人通过冒险（创新）创造更好的生产方式，发现更优的生活方式，族群才能发展壮大；保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个人延续自己生命的物质基础，也是个人摆脱对群体依赖的重要手段，保护私有财产对族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西方形成了保护个人自由、生命以及财产的文化传统。^③

诺亚方舟是西方文明的经典展现。《旧约·创世纪》记载，上帝告诉诺亚七天后将开始连续40天的降雨，消灭地上活物，并和诺亚立约，要求他和妻子、儿子儿媳都进入方舟避难，还要带各类一公一母有血肉的活物，包括飞鸟、牲畜和昆虫，以及各类食物。诺亚方舟反映了西方文明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方法，个人只带自己的家人和财产，独自造船准备转移，其他动物只留一对在船上，而不是与族群同时离开，更不管其他动物的死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孕育出了西方个人至上的文化传统，不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无法作出行动决策；不尊重个人生命，个人将与群体同时毁灭；不保护私有财产，个人不能制造应对灾难的工具。

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个人主义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多弊病：一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国际斗争不绝，国内纷争不断；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在贸易中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价格机制、交易方式，在社会中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判决尺度，交易无法进行，交流受到阻碍。

西方社会采取多种方式平衡个人主义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措施：一是推广一神宗教，希腊、罗马都逐渐废除多神教，推行具有共同上帝的基督教、天主教或东正教等一神教，使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民众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大大提高了社会稳定性；二是实行依法治国，普通法系（英美法系）根据以往的

^① 格鲁-撒克逊人，公元407年罗马军队撤出不列颠岛之后，开始逐渐进入，并成为英格兰王国的主体民族。

^② 渔猎与游牧有一定差别，主要依靠山林或河海中的动物生存，家庭几乎没有其他财产，不影响本文分析结论。

^③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55-65页。

判例逐渐形成一种在全国普遍适用的法律,大陆法系(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则以成文法的制定和运用为主,法律具有明确性、稳定性、可预期性,为民众交易、交流提供可靠的行为准则。

另外,西方民众形成了三权分立思想。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公元前683年,雅典结束王政时代,实行贵族统治,从公元前594年至前593年梭伦(Solon)改革开始,又经过公元前509年至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雅典民主政治逐步确立,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五百人议事会负责落实公民大会的决策,陪审法庭是国家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通过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差额选举制等方式确保每一个公民都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机会。罗马共和国由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权分立,人民大会由贵族和平民组成,元老院全部从贵族中选择,执政官每次选举两名、任期一年,负责执行人民大会和元老院的决议,这种制度让罗马共和国不断繁荣发展。

总而言之,政治体制是人民意愿的集中表现,而西方民众形成了三权分立思想。盎撒人祖祖辈辈依靠游牧/渔猎为生,主要财产是牲畜,而且个体必须离开族群来谋求生存、发展,所以形成了保护个人自由、生命以及财产的文化传统,以及一神宗教、依法治国等社会规则,这是美国形成三权分立体制的历史原因。

2. 三权分立的运行机制

美国是移民形成的新兴国家。17世纪初,英国开始向北美移民,而移民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艰苦的工人以及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然后又有来自法国、德国、荷兰、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陆续涌入,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十三块殖民地。但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北美地区居民强烈不满,从1776年到1783年,北美十三州在华盛顿领导下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正式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美国独立后积极进行领土扩张,逐渐占据由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广阔国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奠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并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①

《五月花号公约》和《独立宣言》是美国历史上两篇重要文献,体现着美国形成了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中心的立国思想。1620年11月11日,一艘排水量约180吨、长27米,名为“五月花号”的捕鱼帆船,载着102名英国清教徒,经历了缺水、断粮、风浪等种种严峻考验,在经过了几十天的漂泊之后,北美大陆的海岸线映入人们眼帘。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讨论着如何管理未来新世界的问题,究竟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他们要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为了建立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团体,他们签署了一份公约——《五月花号公约》,被称为“美国的出生证明”,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并且将依法治理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事务。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特点是国家小部分权力集中于联邦,而联邦政府三权分立,形成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1781年至1787年,13个殖民地根据《联邦条例》(1777年11月15日通过)成立以大陆会议为形式的松散中央政府,而大陆会议既没有征税权,也缺乏全国性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所以各州对联邦政府非常不重视,经常不派人参加中央会议。1787年5月,乔治·华盛顿在费城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经过3个月的秘密讨论,会议否定了《联邦条例》,并制定《美国联邦宪法》,而这次会议也被称为制宪会议。为了新宪法尽快被批准通过,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公开发表大量书信,讨论联邦政府应该拥有的权力、分权制衡的原则等问题,这些信件后来收录于《联邦党人文集》^②。

宪法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石。《美国联邦宪法》(1787年9月17日签署)规定联邦政府只享有宪法明

^①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5-135页。

^②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8-2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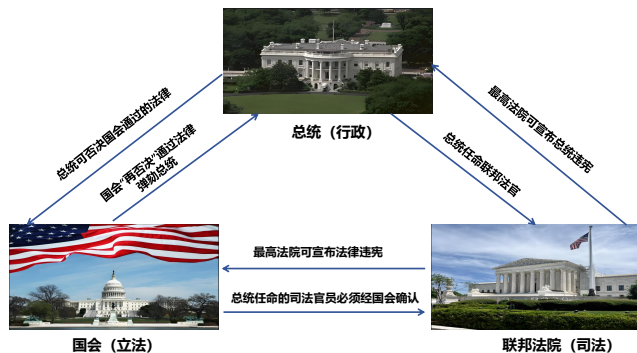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三权分立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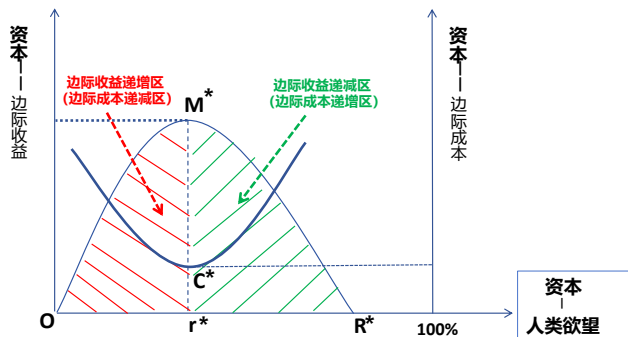


图2: 科技水平不变条件下的资本集中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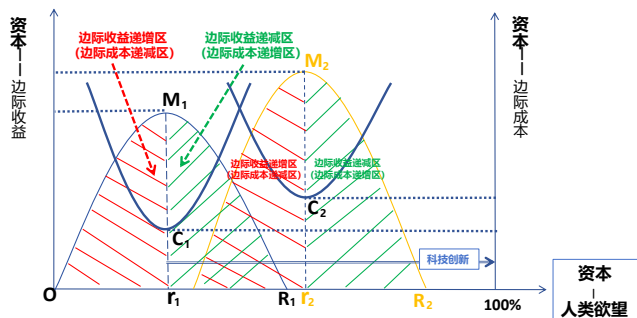


图3 科技水平提高条件下的资本集中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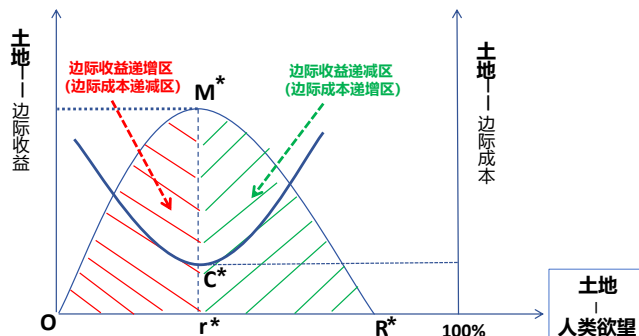


图5 科技水平不变条件下的土地集中规律

确列举的授予权力，比如货币发行权、对外宣战权等等，也有一些权力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享有，比如征税权，未列举的保留权力归各州所有，而各州高度自治。美国宪法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为体现制约与均衡原则：法律需要国会通过，但总统有否决权；即使总统通过了，最高法院也可以指出里面的某个法律违反了宪法的某个基本原则；没有另一方的认可，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以完全做主。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为国家稳定和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基础，确保了政府的制衡和公正，使美国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相对的政治稳定性。

总体来看，三权分立体制有利于有效制约政府权力，而有效制约权力使国家长期保持稳定。由于国家权力少部分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权力又划分为三个部分，而不是由一个人或机构掌握，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平衡，保证了政府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3. 社会的创造财富机制

美国政府权力已经受到有效制约。权力受到有效制约非常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又是创新，使美国引领了一次又一次全球科技革命，最终美国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成为超级大国。

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促进保护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企业家创新的物质基础。1689年至1690年，洛克出版了《政府论》，使洛克成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指出人们按契约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国家不应干涉公民的私有财产，甚至进一步认为私有财产是人权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则无人权可谈，而他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我的茅屋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①。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宣告了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1791年12月15日批准）规定：“任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生命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权力受到有效制约能够保护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有利于国家形成思想市场。思想是科技创新的源

^① 洛克：《政府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7-32页。

泉,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思想市场是人们进行思想创造、交流及竞争的场所。科技创新是知识的积累、分享、拓展以及应用,这都依赖于思想市场的有效运作,所以思想市场还会决定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和新行业创立的速度,即直接决定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由于人类在求知过程中的无知不可避免,思想市场能帮助人类接近真理,所以没有思想市场将会危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美国《权利法案》^①确立了一系列个人的自由权利,如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平集会请愿自由等,使美国形成了有效的思想市场。

权力受到有效制约要求政府维护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是企业家创新的制度基础。美国的税收制度是政府在个人或企业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之后征税,主要对个人征收所得税、财产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而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几乎不纳税,这种税收制度既提高经济效率又促进分配公平。美国形成追求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坚决反对垄断,防止经济资源过度向少数大公司集中,而相关中小企业越来越缺少资金推动科技创新,导致无法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美国富豪积极用慈善捐赠缓解贫富差距,索罗斯、沃伦·巴菲特等120名亿万富翁,2001年在《纽约时报》联名反对取消遗产税,认为取消遗产税将会造就贵族政治,使得他们的后代子孙不劳而获,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违反社会公平原则。

因此,权力受到有效制约非常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精神。1765年织工哈格里斯夫发明珍妮纺纱机、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从此以后人类社会正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以来,国家发展就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群体的核心特质。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认为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与土地、劳动、资本三个生产要素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并将“企业家精神”视作第四个生产要素。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企业家精神放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并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是创新,开发新技术、创造新产业、发现新市场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②。

创新是奠定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了阿帕网(ARPANET),这就是互联网的起源,而互联网发展出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新兴行业,使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埃德·罗伯茨发明了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Altair 8800,使计算机技术走进了普通家庭,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便利性,同时推动软件行业快速发展,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打下坚实基础。总而言之,美国是世界上科研投入最多的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顶尖科技人才和优秀高科技企业,引领着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全球科技革命。

综上所述,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精神,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工业经济时代以来,国家发展就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企业的生命活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又是创新,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言论自由,使政府决策更加公正和平衡,这非常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精神,使美国引领一次又一次全球科技革命。

(二) 三权分立体制的劣势

1. 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贫富差距拉大会严重破坏三权分立体制。196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科学界的马太效应》一文中提出“马太效应”的概念,即优势往往会获得更多的优势,^③其名称来自于《圣经·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社会财富会向资本所有者集中(美国建立于工业经济时代,主要生产资料是资本)。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发表《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

^①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至10条,1789年9月25日提出,1791年12月15日批准。

^②熊彼特:《熊彼特经济学》,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第94-115页。

^③R·K·默顿:《科学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05-632页。

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在可以观察到的 300 年左右数据中，投资回报率平均维持在每年 4%~5%，而 GDP 平均每年增长 1%~2%。5% 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每 14 年财富就能翻番，而 2% 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 35 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资本拥有者的财富翻了 7 番，是开始的 128 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 100 年前大 8 倍，即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贫富差距却变得非常大。^①

资本又逐渐向少数大资本集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资本集中的过程：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只能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而劳动生产率则取决于资本的生产规模和科技水平，所以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是现代经济的必然趋势。资本集中是指少数大资本不断吞并大多数中小资本，以至于少数大资本规模逐渐增大：竞争使生产规模大和科技水平高的大资本占据优势，从而战胜或吞并中小资本；信用的发展把社会上闲散资本集中到大资本手中，同时也可以股票的形式将中、小资本组成规模巨大的股份公司。总之，资本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②

但是，资本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在科技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不变时，连续地增加资本投入，产品增量（收益）在超过某一点（ M^* ）后将会下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是永恒的矛盾：

在科技水平不变时，会出现两个现象：一是边际收益递减，经济资源是有限的，随着资本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增加每一单位资本带来的收益都会下降，导致国家整体的资本收益同时下降，社会创造财富总量逐渐减少；二是边际成本递增，人类欲望是无限的，资本拥有者增加每一单位收益，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即资本会加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同时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见图 2：科技水平不变条件下的资本集中规律）。

资本为摆脱边际收益递减区的束缚，会推动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而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规律是：在发展初级阶段，大量企业是传统制造业，少部分是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生产成本较低，企业通常只需投入少量的研发资金，投资科技创新失败的风险比较低，所以社会投入同量资本创造财富总量会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在发展高级阶段，大量企业是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生产成本比较高，尤其是在摩尔定律制约下，企业必须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而且投资科技创新失败的风险比较高，所以社会投入同量资本创造财富总量会下降，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见图 3：科技水平提高条件下的资本集中规律）。

衰败的祸根通常在兴盛时种下，兴盛的契机往往在衰败时产生，所以西方文明也是兴衰交替。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体制，也很难摆脱边际收益递减区束缚，即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利益群体手里，大多数利益群体缺乏生产、生活的资源，社会创造财富总量持续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经济发展速度逐渐降低，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国家走向衰败。

2. 资本集中与权力集中

资本集中与权力集中密切联系。少数人拥有大量资本时，同时会拥有更大的经济、政治影响力，这使他们能够在资源分配和社会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还可能导致政府在保护民众权利过程中产生不公平现象。在经济领域，富有的企业家和大公司会占据更多资源，使他们在市场上能够影响商品价格、产业格局以及竞争方式，从而影响市场配置经济资源，导致消费者选择受限、权益受损。在政治领域，富有的企业家可以通过游说、捐款等方式左右政府决策，既导致他们能够在政治上获得更多话语权，又可能造成国家政策偏向某些特定利益群体，而不是充分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资本集中对权力集中会产生深远影响，而权力集中会导致政府无法公平、有效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③

因此，美国崛起很多将资本与权力集于一身的政治家族。美国政治家族通常都经历了三至四代的不懈

^①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203-238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 年，第 447-515 页。

^③ “拜登发表告别演讲：美国正在形成‘寡头政治’”，搜狐网，2025 年 1 月 26 日，https://m.sohu.com/a/849613079_656058。

努力，而这些家族的成员就是所谓国家精英，轻则多名成员出任美国各州或联邦的高级官员，重则被人推举出任总统，以此左右整个国家发展方向。我们熟知的美国政治家族，主要有：肯尼迪家族，1848 年爱尔兰人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移民美国，其家族成员约翰·肯尼迪在 1960 年 11 月当选美国第 35 任总统，还有其他家族成员担任过司法部长、参议员、众议员、驻外大使等重要职位；布什家族，家族创始人塞缪尔·P·布什（1863 年至？）是美国著名钢铁石油大亨，其家族成员乔治·赫伯特·布什（老布什）、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分别担任过美国第 41 届、43 届总统。

3. 资本缺乏制约产生的问题

美国已经形成了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却无法战胜资本的发展规律，并且确实暴露出很多问题：

第一，社会群体阶级化。美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的经济状况很难改善，上层阶级更容易维持其地位，底层阶级很难脱离贫困，^①使得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一代又一代之间保持不变或难以改变，社会各个群体出现阶级固化现象，而这也是美国陷入两党政治的重要原因。事实上，19 世纪中期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开始主导美国政治，而许多美国缔造者对党派组织深感不信任，华盛顿在 1796 年告别演说中就警告“政党轮流统治本身就是可怕的专制”。另外，随着两党政治的加剧，美国蓝州和红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从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到社会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对立和冲突愈加明显。

第二，联邦政府傀儡化。美国的缔造者们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让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互相制约、平衡，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但资本集中却导致国家权力集中到少数资本集团手里。美国崛起了少数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投资机构，几乎控制了全部上市公司（如表 1）：领航集团（Vanguard Group），1975 年成立于宾夕法尼亚，管理着超过 6 万亿美元的资产；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Inc）1988 年创立于纽约曼哈顿，2022 年末整体管理资产规模为 8.59 万亿美元，还有道富集团、富达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等国际著名投资机构。2024 年初，美国法院公开了萝莉岛事件参与人员名单，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哈佛法学教授肖维茨、CIA 局长伯尔等美国各界的实权人物，可见资本集团对美国政治的掌控程度。

表 1: 美国代表型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截至 2024 年 3 月 10 日）

主要股东	美国钢铁	通用电气	英特尔	苹果	英伟达
第一大股东	领航集团	Capital Group	领航集团	领航集团	领航集团
持股比例（%）	8.98	9.40	9.12	8.27	8.27
第二大股东	贝莱德	领航集团	贝莱德	贝莱德	贝莱德
持股比例（%）	8.87	8.00	8.04	6.66	7.27
第三大股东	DFA Fund	贝莱德	道富集团	伯克希尔·哈撒韦	FMR LLC
持股比例（%）	4.74	6.20	4.45	5.92	5.61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美国钢铁和英特尔为流通股股东，其余三家公司为股本股东，股本股东主导公司运营，权益更高。

第三，利益集团藩镇化。“军工复合体”是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掌握了美国的战争决策权，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带来的危害。军工企业是“军工复合体”的核心力量，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洛普·格鲁门、通用动力、哈里伯顿是美国最主要的军工企业，而这些军工企业的主要股东基本全是金融资本性质的著名投资机构（如表 2）。“军工复合体”频繁发动战争，是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竟然默许以色列残杀加沙地带的妇女、儿童，致使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

第四，联邦各州独立化。美国是各州联合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宪法没有规定不允许各州独立，联邦成

^①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87-124 页。

表 2: 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和国防承包商的股权结构（截至 2024 年 3 月 10 日）

股本股东	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	诺斯洛普·格鲁门	通用动力	哈里伯顿
第一大股东	道富集团	领航集团	道富	Longview Asset	领航集团
占总股本（%）	14.40	7.70	9.30	10.30	10.97
第二大股东	领航集团	Newport Trust	领航集团	领航集团	贝莱德
占总股本（%）	8.70	7.40	8.00	8.10	9.00
第三大股东	贝莱德	贝莱德	Capital Investors	Newport Trust	Capital Investors
占总股本（%）	6.80	5.60	8.00	6.00	7.10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

员将军事、外交等权力交给联邦政府，而各州在内部事务上仍有相当的自主权，所以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博弈。美国各州经常爆发独立运动，加州是美国第一大州，面积 41 万平方公里，2023 年人口 4012 万，经济总量（GDP）3.90 万亿美元（2023 美国 GDP27.36 万亿美元），独立倾向却由来已久，而 2023 年至 2024 年初，德州又与联邦政府就移民政策分歧展开武装对峙。美国很多州已经开始探索去美元化，德州、佛蒙特州已经计划发行锚定黄金的数字货币，2023 年 12 月 28 日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宣布将黄金作为法定货币，标志美国大多数州正式宣布货币独立。

（三）改变三权分立的利弊

三权分立体制确实产生很多问题，是造成欧洲分裂成四十多个国家的重要原因，而改变三权分立体制也是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中央政府能够集中权力，藩镇化的军工复合体被彻底解散，各州政府的独立倾向得到有效控制，很多篡夺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都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弊的一面是，中央政府很可能推行思想统一、法律统一、政令统一，增加对地方、民众的管控力度，使个人丧失发挥创新精神的土壤，国家陷入死气沉沉之中。以罗马帝国为例，公元前 27 年元老院放弃共和制，屋大维获得君权及奥古斯都头衔，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但内部矛盾仍持续激化，导致公元 192 年皇帝康茂德被刺杀身亡，罗马帝国最终也走向衰亡。

由此可见，三权分立体制很难改变。“三权分立”体制下形成了有效制约权力的制度体系，使美国引领一次又一次全球科技革命，却无法战胜资本的发展规律，而且“三权分立”使国家权力非常分散，广大民众也处于分裂状态，整个社会很难形成合力解决制约资本问题，这严重威胁到国家长久统一，所以古希腊、古罗马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二、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及劣势

（一）中央集权体制的优势

1. 中央集权的历史原因

气候环境影响民族性格，更能影响国家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起源于长江、黄河流域，位于北纬 30° 至北纬 40° 之间，包括河套平原、黄土高原、江淮平原等，气温处于 -5℃ 至 41℃ 之间，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适合发展农业生产，主要食物为谷物、蔬菜，所以中华民族内敛温良、追求和合，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中国社会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族群主要财产是土地，土地无法转移，面临天灾人祸农民也无法离开土地，族群全体成员只能共同参与生产、生活；二是个体与群体无法分离，个体成员离开土地很难生存，整个族群只能团结起来应对天灾人祸，所以个体与家庭、家庭与族群必须密切合作。

家国一体是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化出一套适应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各自为战则无法进行社会分工，整个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会大打折扣，

甚至子孙后代也必须保持合作,愚公移山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个人可以牺牲生命,个人发展依赖群体发展,中国人能够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中国人的传统生命观;个人能够舍弃财产,土地只能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即使个人放弃土地,家庭或国家的土地数量也不会减少,所以中国人没有形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因此,中国人认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而自己可以为此献出生命和财产。

大禹治水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展现。大禹率领民众,面对滔滔洪水,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举全社会之力,不同地区、不同部族为共同应对天灾而团结在一起,百姓、诸侯全民参与,声势浩大、规模空前,成为中华民族齐心合力、患难与共的成功范例。大禹治水是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每个人都必须抛弃自身利益,促成各地区、各部落团结融合,为种族延续、文明发展而齐心协力抗击洪水,是治水工程胜利的先决条件。

另外,中国民众逐渐形成了“大一统”思想。“大一统”(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是中国夏商周时代建立国家的理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将原有“大一统”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孔子(《论语》)针对诸侯之间攻伐不断的混乱局面,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社会秩序,而孟子(《孟子》)则主张天下“定于一”,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管仲(《管子·君臣上》)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大一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国家通常会推行统一的意识形态,而真实世界却是发展的、变化的、多样的,所有民众都坚持同一思想,国家缺乏健康的思想市场,造成社会弊端丛生、停滞不前;二是国家通常会颁布统一的法律制度,而法律具有强制性,却很难随着社会发展及时调整、修订,导致国家法律制度落后于民众生产、生活实践,国家与民众之间矛盾重重。

中华文明采取很多措施平衡“大一统”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政策:一是坚持信仰自由,中国自古以来就允许民众信仰不同的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华夏大地传播、发展,也允许不同地区的民众信仰不同的神灵,使中国思想多样化,为社会问题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二是实行以德治国,中国的先贤深刻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尤其是秦朝灭亡的惨痛教训,认为中国必须坚持以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道德是柔性的法律,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大多数人接受就可以改变道德准则,即以德治国能够与时俱进、教化民众。

总而言之,政治体制是人民意愿的集中表现,而中国民众逐渐形成“大一统”思想。中国人祖祖辈辈以农业为生,主要财产是土地,而且个体必须紧紧依靠群体来生存、发展,所以形成个人可以为国家付出生命、财产的文化传统,以及信仰自由、以德治国等社会规则,这是中国形成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原因。

2. 中央集权的运行机制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历史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主要发源地的华夏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公元前2070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出现,随着东周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至公元前221年,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这一制度沿用至清朝。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中国却进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形成中央政府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体制。商鞅变法采取很多措施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政治层面,全面推行郡县制,设立郡县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和管理,中央政令可以直达地方,不再由各级贵族传达,使地方权力开始向中央全面

集中；经济层面，“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制，推行土地私有制，承认百姓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百姓从贵族的土地上得到解脱，由中央对百姓实行直接经济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制定“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政策措施，并颁布全国统一的《律令》，铸造全国统一的钱币，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自称始皇帝，将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大权集中于自己手中，大小政事皆由皇帝裁定，这种制度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废丞相、设内阁，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组织，中央权力全面向皇帝集中（如图4）；清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后增设军机处，同时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总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来源于皇权，皇帝成为政治制度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其他官员和贵族必须服从皇权，形成皇权超越一切权力的政治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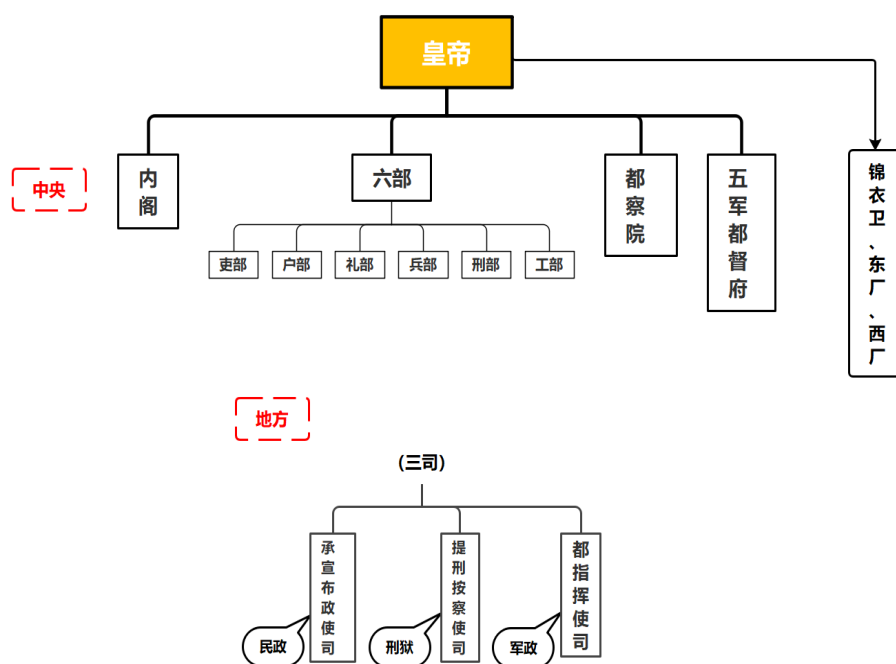


图4：明朝中央集权体制

但是，国家只有充分保护人民权利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尚书》、《礼记》记录了从尧、舜、禹到春秋战国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君王言论、重要事件及先贤思想，而提出“大同社会”治国理想的《礼运大同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所以建立“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中国人民祖祖辈辈的共同追求。儒家、道家和佛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深刻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而三家的核心思想、治国方式都有很大差异，儒家坚持“以民为本”，道家提倡“无为而治”，佛家呼吁“普度众生”，但都认为统治集团应该充分保护人民权利。

中国先贤还认为国家必须均衡财富分配。孔子认为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社会不安、政权不稳的根本原因，在《论语·季氏》中指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商鞅则主张国家通过政策法令使财富分配均衡，在《商君书·说民》中指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国家发展，很多思想家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此外，历代的农民运动领袖也以“等贵贱、均贫富”作为革命口号，如秦末的陈胜、吴广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明末的李自成则提出“均田免赋”。

总体来看，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拥有最高权力，而这非常有利于维护国家完全统一。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拥有最高权力，能够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统一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有

效管理国家事务,避免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对国家政权的干扰和破坏,保证国家完全统一。

3. 社会的创造财富机制

中国人民矢志不渝地追求国家完全统一。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完全统一,在全国统一下又会形成大规模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能够创造巨额财富,所以中央集权体制能使国家繁荣富强。

中央集权推动国家确立主流意识形态,而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又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石。经历了夏、商和西周松散的统一,东周时期中国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战火、流离与灾荒,黎民百姓迫切希望统一,使“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坚不可摧。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才能巩固和维护政治统一,只有政治统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于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此后,儒家思想确立了正统与主导地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抑制了个人的创新精神,使中国没有形成有效的思想市场,却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

中央集权要求政府拥有经济力量维护国家统一,而国家统一是形成社会分工的制度基础。汉昭帝始元6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大将军霍光召集民间贤良、文学入朝,同御史大夫桑弘羊,就是否应该继续实施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营等经济政策展开辩论,这场会议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制度。《盐铁论》记载会议讨论的重心是盐铁国有制是否继续下去,贤良、文学同桑弘羊一方针对盐铁国营、酒类专卖、统一铸钱、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展开争论,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制,始终贯穿全书。“盐铁会议”充分探讨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又允许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重点防止私人垄断危害国家政权。

因此,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央集权使中国形成统一国家,为社会分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社会分工创造巨额财富。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经济学名著《国富论》,认为社会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而且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容易深入下去,分工越深入产品附加值就越高,整个社会生产剩余就越多,有生产剩余就会鼓励人们进行更多生育,人口规模就会增加,国家也越来越繁荣。《国富论》从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扩展到产业分工,然后又推广到国际分工,并指出“有了分工,同量劳动者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亚当·斯密举的著名例子是制针,制针有18道工序,若不分工,一个人一天难以制造一枚,通过分工,平均每人每天可制造4800枚,可见社会分工创造了巨额财富。^①

中国在分裂的时代就贫穷落后。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代,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周王室走向衰败,各诸侯不再听从周天子号令,那时开始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各国都有雄主、名将、谋士以及思想家,互相征伐争霸,仅长平之战秦国就坑杀赵国士兵40万,至公元前221年秦国才统一中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代,由公元220年曹丕篡汉自立开始,至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重新统一结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又经历五胡乱华的大乱,全中国人口锐减百分之九十,从东汉后期顶峰6000万降至谷底500万,中国人形成“宁做太平犬,莫做乱世人”的观念。

中国在统一的时代就繁荣昌盛。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年至前141年)是汉朝第一个治世,汉朝公元前202年正式建立,汉初国家非常贫穷,皇帝刘邦想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都做不到,经过短短23年,汉朝就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国库充盈。贞观之治(公元627年至649年)是唐朝第一个治世,唐朝618年正式建立之时,经历过隋朝末年的大动乱,全国人口从860万户跌至200万户,经过不足10年时间,国力就迅速增强(《资治通鉴》)。康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开始,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6年)结束,而清朝公元1644年才正式入关并统治全国,不足20年,就开启长达百年的盛世。这些盛世,既有君主为政贤明、励精图治的个人因素,更有国家统一下社会分工创造巨额财富的制度因素。

综上所述,中央集权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完全统一,而国家完全统一有利于形成社会分工。在农业经济时代,世界范围内科技水平都没有明显进步,但中国却在文化、艺术、医学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6页。

截至 1820 年，人口占全世界 37%，经济总量占全世界 33%，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一经济大国，^①正是由于国家完全统一下的社会分工创造巨额财富。

（二）中央集权体制的劣势

1. 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贫富差距拉大会严重损害中央集权体制。马太效应也被用于概括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相关的社会现象，在农业经济时代表现为（中国古代是农业经济，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富有个体可以利用其土地来获取更多资源和机会，贫困个体可能因缺乏土地而更加难以脱离贫困，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土地同样会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土地兼并就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同时中小地主、普通农民则丧失越来越多的土地，但是土地集中的规律明显不同于资本集中：一是规模经济，土地大规模耕作有利于投入物的节约和充分利用，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费用和投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土地的人工成本，即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低，所以土地规模越大越呈现规模经济；二是分工优势，土地规模越大，土地拥有者就可以雇佣越多劳动力，或者将土地出租给更多缺少土地的农民，而劳动力数量越多社会分工越容易深入，社会分工越深入则产品附加值越高，所以土地规模越大越具有分工优势。因此，土地兼并成为农业经济时代中央集权体制下难以治愈的顽疾。

但是，土地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在科技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不变时，连续扩大土地耕作规模，产品增量（收益）在超过某一点（ M^* ）后将会下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是永恒的矛盾：

在科技水平不变时，会出现两个现象：一是边际收益递减，经济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土地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增加每一单位土地带来的收益都会下降，导致国家整体的土地收益随之下降，社会创造财富总量逐渐减少；二是边际成本递增，人类欲望是无限的，土地拥有者增加每一单位收益，需要耕作更多的土地，即土地会加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同时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见图 5：科技水平不变条件下的土地集中规律）。

土地拥有者为摆脱边际收益递减区的束缚，也愿意推动社会进行科技创新，但中国科技水平在封建社会却没有明显进步。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其编纂的 15 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李约瑟之谜”，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试图从科学角度给出这个问题的谜底：一是中国没有具备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停留在经验阶段；三是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究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之上，等等。但是，这些答案他自己也不满意，只为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思考线索，而中国科技水平确实没有明显进步。^②

因此，中国封建王朝总是重复兴衰轮回。每个王朝成立初期，因战乱导致人口锐减，荒地较多，往往平均分配土地，鼓励农工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开始繁荣。不久之后，社会又开始土地兼并，直接后果就是：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民起义不断，直到推翻旧王朝，又建立新王朝。土地兼并使中国战乱频繁，以《资治通鉴》为例，从公元前 403 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至公元 959 年停笔，包含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共记录了大大小小两千多次战争，而每次王朝更迭都会造成人口减少十之六七。

历史的“形”变幻无常，历史的“神”却从未改变，所以中国封建王朝总是重复兴衰轮回。国家实行“中央集权”体制，也很难摆脱边际收益递减区的束缚，即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利益群体手里，大多数利益群体缺乏经济资源生产、生活，社会创造财富总量持续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国家走向衰败。

^①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5 页。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20 页。

2. 土地集中与权力集中

土地集中与权力集中密切联系。中国历史大部分都处于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整个社会的第一生产要素,所以土地集中与权力集中密不可分,而地主阶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勋贵地主,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为了奖赏帮自己打天下的功臣,通常会用土地作为奖赏,分封给自己的功臣和宗亲,这部分人本身就掌握政治权力,是国家政权的主导者,又会通过购买或巧取豪夺等手段占有更多土地;二是普通地主,他们通常通过购买、继承或其他手段获得土地,主要通过出租土地给农民或雇佣农民耕种土地来获取收益,有足够经济资源接受良好教育和文化熏陶,对当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具有较大影响力。同时,大地主为了拥有更多的土地,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尤其是灾年,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

因此,统治集团无法摆脱自身利益的困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坚决维护人民利益才拥有合法性,所以统治集团表现出复杂的两面性:当社会发展要求打破现有制度框架,并且打破现状给自身带来的收益大于损失时,统治集团敢于冲破制度藩篱,积极为民众谋福祉、为国家谋富强;当社会发展要求建立制约权力的制度体系,以至于给统治集团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利益时,他们宁可政权颠覆、国破家亡也绝不放弃自身利益。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①

3. 权力缺乏制约导致的问题

中央集权体制有利于维护国家完全统一,却很难形成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在历史中确实暴露出很多问题:

第一,中央政府皇帝化。国家权力来自于个人权利的委托和转让,即分散的个人权利转化为集中的国家权力,而中央集权体制又使国家权力大部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因此,中央政府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过于强势,难以接受监督和制约,尤其是皇帝权力缺乏制约,很可能滥用权力侵犯个人权利,或者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②时决策失误,或者将统治集团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而有所欲为。皇帝权力不受制约是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以隋炀帝杨广(公元569年-618年)为例,604年登基继位,开创科举制、修建大运河对后世颇有影响,但频繁发动战争,先后三次攻打高句丽,亲征吐谷浑,导致民变不断、天下大乱、隋朝灭亡。

第二,皇帝个人傀儡化。自秦朝到明清,中央集权为历朝历代所沿用,权臣篡位、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却在中国历史上轮番上演,甚至掌握了皇帝的生死和废立,是中国陷入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皇帝拥有超级权力却是这些乱象的根源,权臣是皇帝之四肢,属于皇权之影射;宦官是皇帝之私人,属于皇权之溢出;外戚是皇帝之分身,属于皇权之假借。另外,皇帝只是统治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代表,统治基础在于获得这个特权群体的支持,如果某个人窃取其中部分或大部分成员的支持,皇帝自然就会沦为傀儡。以东汉末年为例,汉灵帝驾崩,外戚何进为与宦官张让为首的十常侍争夺废立皇帝之权,令凉州董卓、并州丁原进京,导致天下大乱。

第三,官僚集团权贵化。中央集权体制下权力很难受到制约,使官僚集团以权力为媒介直接或间接占有大量资本、土地的收益权,形成官僚资产阶级,享受超高水平的生活,而他们绝不会放弃这种权力。由于退休制、任期制以及轮换制等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占有权非常不稳定,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表现为权力斗争,而且是权力带来的收益越大,斗争也就越激烈。权力还会像资本寻求持续增殖一样,不断扩张使用边界,导致官僚资产阶级占有和消耗的财富总量越来越多,而人民却越来越缺少财富进行生产、生活以及养育后代。因此,清朝的和珅由于权力斗争而被抄家赐死,民国的四大家族则被中国人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624页。

^②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相关信息的了解有很大差异,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乔治(G.Akerlof)、斯蒂格利茨(M.Spence)、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对此关注和研究。

民用武力赶出大陆。

第四，地方政府藩镇化。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差距非常大，中央政府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是收集的信息是否真实，作为超大国家的中央政府，要面对无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依赖于及时收集真实信息，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很难收集到真实信息；二是收集真实信息的成本，中央政府有强烈意愿收集到真实信息，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民众面对的问题，而收集信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收集真实信息的成本很高^①。因此，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且有权的机构，在中央失去绝对统治力之后，或者地方势力增强之时，就会造成“强干弱枝，尾大不掉”，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局面。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范阳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联合史思明发动叛乱，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爆发，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三）改变中央集权的利弊

中央集权体制下权力很难受到制约，是造成中国两千多年没有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改变中央集权体制无法解决有效制约权力的问题，而且对国家发展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思想获得极大解放，民众的创造性被释放出来，会推动国家文化繁荣、科技进步，中国会重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有弊的一面是，不同地区、不同民众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国家会随之而陷入分裂之中，民众又会重复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绝的苦难。以中华民国为例，中国全面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各个地区高度自治，文化思想空前繁荣，比封建社会的清朝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军阀之间攻伐不断，日本以不足中国一省之地，竟敢开启全面侵华战争。

由此可见，中央集权体制不可动摇。“中央集权”体制使中国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富强，由于权力缺乏制约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中央集权”使国家权力更容易整合，广大民众的“大一统”观念也坚不可摧，整个社会能够形成合力解决这些问题，使国家可以长久保持统一，所以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能够绵延不绝。

三、政策建议

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政治体制。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起以美国总统制为模式的、不完整的三权分立体制，先后实行过总统制、五院制、责任内阁制等各种政体，国家却没有走向繁荣富强，反而军阀割据、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积贫积弱，最终日本乘虚而入，发动妄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边缘。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重新建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体制，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位，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指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走符合自己历史文化特点的发展道路，建立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公开公正，坚决维护宪法权威

我们要深刻理解坚决维护宪法权威的内在含义：坚持宪法精神，核心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或权力如何，都应受到相同的法律待遇，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并在违法时承

^① 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8页。

担同等的法律责任,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坚持依宪办事,即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 正心正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我们要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内在含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坚持党的指导思想,核心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实现人民利益,是衡量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坚持党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党拥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根源,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三) 实事求是,深入推进政治建设

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障,其核心是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确保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一是制定正确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党必须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规律,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治路线,为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二是争取人民群众支持,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党必须从战略高度把握政治路线和群众支持之间的辩证关系,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同时使党和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力量。

(四) 关心群众,切实解决群众问题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其本质要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党员干部必须切实解决群众问题:一是关心群众生活,党员干部要始终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了解群众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关注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困难;二是注意工作方法,坚持调查研究,运用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准确把握群众需求和企业困难的本质,同时调动群众参与解决问题的积极性;三是听取群众意见,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对问题的认识和感受最为直接、深刻,要建立健全群众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将问题处理情况向群众公开。

作者简介 周友刚,男,满族,1983年出生,河北秦皇岛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创新经济学、企业经济学。电子信箱 zyg031@163.com, <https://orcid.org/0009-0007-4436-4278>。张立垚,女,汉族,1985年出生,山西省汾阳市人,兰州市科协首席科普专家团队成员,数学博士,研究方向:数理分析、亚洲区域经济学。电子信箱 zlyy945@163.com, <https://orcid.org/0009-0005-4654-9183>。

引用本文 周友刚,张立垚.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美国政治体制?——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J].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2025,7(6):80-95.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610>.

Cite This Article Yougang ZHOU, Liya ZHANG.(2025). Why Can't China Simply Cop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7(6):80-95.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610>

Why Can't China Simply Cop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Yougang ZHOU¹, Liya ZHANG²

1.Center for World Economy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Beijing,China;2.Lanzhou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30030, Lanzhou, Gansu,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at effec-

tively restrains governmental authority, enabl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d one wave after another of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However, it cannot overcome the inherent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disperses state power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are also placed in a fragmented condi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ociety as a whole to form a united force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constraining capital. By contrast, a centralized system is highly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the country's complete unity and has enabled China, time and again, to move toward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yet it finds it difficult to develop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at effectively restrains governmental authority. At the same time, centralization makes it easier to integrate state power, and the popular commitment to a "great unity" (da yitong) is likewise unshakable, so that society as a whole can form a united force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constraining power. Therefore, China must adhere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follow a path suited to its ow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can effectively restrain government power, so as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separation of powers; centralized authority; constraining power;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increasing marginal costs

(责任编辑: 李昌奎 Email: cpcl@cpcl.hk)